

菊与刀 日本文化的类型

[美] 鲁思·本尼迪克特 著 王博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菊与刀

日本文化的类型



[美] 鲁思·本尼迪克特 著 王博 译



YZLI0890108592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菊与刀/ (美) 本尼迪克特 (Benedict, R. F.) 著; 王博译.
——合肥: 黄山书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5461 - 1641 - 9

I. ①菊… II. ①本… ②王… III. ①文化 - 研究 - 日本
②民族心理 - 研究 - 日本 IV. ①G131.32 ②C955.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0002 号

菊与刀

(美) 本尼迪克特 著 王博 译

出版人: 左克诚
责任印制: 李 磊

责任编辑: 刘 翔
装帧设计: 艾博堂

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 (<http://www.hsbook.cn>)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 230071)
发行: 北京时代联合图书有限公司 电话: 010 - 6551362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电话: 010 - 61202350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8 字数: 179 千字
版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461 - 1641 - 9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研究课题——日本	1
第二章	战时的日本人	18
第三章	各得其所	36
第四章	明治维新	60
第五章	欠历史和社会的恩情	76
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	89
第七章	情理难却	104
第八章	洗刷污名	114
第九章	人情世界	139
第十章	道德的困境	153
第十一章	自我修养	180
第十二章	儿童的学习	200
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235

第一章 研究课题——日本

本章可以看作全书的序言。概括起来说，主要涉及下面几个问题：研究目的——为美国政府战后的对日政策提供理论依据；研究方法——除了实地调查外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可能用到的一切方法，包括文献研究、采访在美国的日本人等；研究思路——通过特定社会中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见解发掘出其背后起支配作用的社会性约束力（即本书副标题中的“文化的类型”，这是作者在她出版于1934年的另一部著作《文化的类型》中提出的理论）；研究精神——既严格（能承认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异）又宽容（能容忍异文化的平等地位）。

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无疑是一种可贵的精神。这不仅仅是一种反思二十世纪灾难性的战争的历史态度。对于二十一世纪，传统意义上的普世价值观遭到质疑、曾经被边缘化的文化开始主张世界文明多元性的背景下，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尤其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态度贯穿了整本书。作者爱拿日本的道德体系、行为准则、思维模式来和西方作比较，强调二者的差别，但从不上贴“优越”或“劣等”、“文明”或“野蛮”、“先进”或“落后”等标签，尤其是考虑到当时美国社会中相当强烈的反日情绪，这种态度就更难得了。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绝对的文化相对主义恐怕只是一种幻想。在现实中，民族文化与意识形态往往是难以区别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往往会成为某一政权规避

某些国际社会共同的行为准则的借口。例如，本书在后边特别强调的一般国民对等级制的信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民族文化、多大程度上属于意识形态的灌输，换言之，这种社会心理学现象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改变？如果像作者一样从等级制中寻找近代以来日本的对外扩张的原因，那么是否意味着这种政治上的后果可以因为其文化上的原因而得到异文化研究者的宽容？事实上，作者这项研究的目的本身已经显示出了混淆文化与政治的倾向。既然这项研究是为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服务的，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单单停留在文化的层面。即使在文化的层面上，文化相对主义是可能的，一旦跨入政治层面，作者也会不可避免地要将论述建立在本国文化的优越性的前提下。因为向战后的日本社会输入美国式的民主价值观就属于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之一。战后，日本确实走上了美国式的民主化道路，甚至连本书中作为民族文化现象来加以描述的一些行为或见解（比如对等级制的信赖），也被战后的日本人斥为战前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表现而加以排斥。

在美国曾经拼尽全力与其作战的对手中，日本人是最难以理解的。在历次战争中我们从没遇到过这样强大的对手，他们的行动与思维方式与我们迥异到迫使我们不得不认真加以分析研究的地步。我们现在就像 1905 年的沙俄一样，面对着一个不属于西方文化传统、但却拥有强大的武装且训练有素的民族。在日本人那里显然不存在西方世界的那一套公认的基于人性的战争惯例。这样一来太平洋上的战斗就不再是简简单单的岛屿登陆和后勤保障工作，而面临着一个更主要的问题——了解对手的本性。要与

之作战，我们就必须了解他们的行动。

这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日本闭关锁国的大门被敲开后的七十五年间，我们习惯于用“如此这般，但又如何怎样”这样令人费解的暧昧表达来描述日本人，这是我们在描述其他民族时所未曾遇到的情况。一个严谨的观察者在谈论到日本以外其他民族时，不会在说他们彬彬有礼后又添上一句“但是他们又倨傲不恭”。同样他也不会做出下面这些矛盾的叙述：这个民族冥顽不灵，“但是他们很快就能适应剧烈的变革”；他们性情温和，但又常常不服从上级管制；他们忠诚、宽厚，“但又有逆反心理，满怀怨恨”；他们生性勇敢，但又如何胆小怕事；他们的行动基于别人的评价（即做事考虑到自己的面子），但他们又真心实意；他们在军队中训练得跟机器人似的，但又经常以下犯上、不服管教；他们既热衷于西方文化，但又极端保守、固执；等等。这位观察者不会在一本书中说了这个民族如何普遍具有审美情趣、如何给予演员艺人以极高的声望、如何热衷于菊花栽培后，又在另一本书中补充说他们崇尚刀剑和武士的荣誉。

然而，这些矛盾的表述却遍及关于日本的论著的每个角落，而且更主要的是，这些都是事实。刀与菊，二者构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日本人生性好战但又性情温和；穷兵黩武但又具有审美情趣；妄自尊大但又彬彬有礼；冥顽不灵但又灵活善变；温良驯服但又不服管教；忠诚但又叛逆；勇敢但又怯弱；保守但又革新。他们在意别人的目光，但即使别人的目光并没有触及自己的劣迹，自己也会陷入罪恶感。他们的军队受到彻底训练，但士兵们却具有反抗精神。

既然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了解日本，那么我们就不能回避这

些矛盾以及其他同样令人头痛的矛盾。我们面临着一个接一个的严峻任务。日本人的下一步行动会是什么？我们能不能不进攻他们的本土就迫使他们投降？应不应该直接轰炸皇宫？我们能从日军俘虏口中获取哪些有用信息？在对日军及日本本土进行宣传时，我们怎样才能避免牺牲更多美国人的生命的同时又消磨日本人困兽犹斗的意志？这些问题即使在日本通中也莫衷一是。当和平来到时，为了维持秩序，我们是否有必要对日本实行永久军事管制？我们是否需要准备在日本荒郊野外的要塞中与顽固分子周旋到底？伴随着世界和平的到来，日本是否会发生一场法国或俄国那样的革命？谁将成为这场革命的领导者？以及日本民族是否只有灭亡这一条出路？这些问题将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答案。

1944年6月，我接受了委托，从事日本研究。我受命以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掌握的一切研究技术为手段，试图对日本民族是怎样的民族这个问题做出一个回答。这一年的初夏，我国刚开始对日本的大规模反攻。在美国，很多人认为对日作战还将持续三年、十年，甚至更久。在日本，人们则相信这将是一次百年战争。他们认为，美军虽然取得了局部胜利，但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距日本本土尚有几千英里之遥。日本的官方报道则拒不承认日本海军的失败，而日本国民依然相信他们才是胜利者。

然而6月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欧洲已开辟了第二战场，德国的投降指日可待，盟军最高司令部制定决策时已没有必要再像两年半以来那样优先考虑欧洲战场了。在太平洋上，我军已登陆塞班岛。这场重要战役预示了日军的最终失败。此后我们的士兵就开始与日军短兵相接。在新几内亚、瓜达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比亚克等战役中，我们逐渐看清了我们面对的敌人

有多可怕。

因此，到了1944年6月，解答关于我们的敌人日本的种种疑问就成了我们的当务之急。对于这些疑问，我们必须给出独到的见解，不管这些见解将用于军事还是用于外交，也不管它们将为最高决策服务还是会为日军前线的宣传工作服务。对于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我们所要了解的，不仅是东京当局的动机和意图，不仅是日本悠久的历史，也不仅是经济或军事上的统计数据。我们所要了解的是，日本政府能从它的国民中获得怎样的支持。我们必须弄清楚日本人的理智和感情的习惯，以及形成这些习惯的模式。我们还必须弄清楚支撑这些行动和意志的内在制约。我们不能直接套用美国人行动的前提条件，应尽量回避做出这样轻率的结论：在某种情况下，我们会怎么做，日本人又会怎么做。

这项任务非常艰巨。美国和日本正处于战争状态。要把一切过错推给敌国很容易，但要弄清楚敌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可就没那么容易了。但这项任务又不得不去做。问题的重点是日本人将采取怎样的行动，而不是我们在他们那种情况下将采取怎样的行动。我必须把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当作“积极要素”或有用资料，而不是当作“负面要素”或不利条件。我还得从文化的角度而非从军事的角度来考察他们参与战争的行为方式。和平时一样，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表现也凸显出他们的民族特色。他们在战争中采取了怎样的行为方式、以怎样的思维模式看待战争？他们的领导人煽动国民的战争激情、消弭国民的不安情绪以及在战场上调兵遣将。我们从他们的这些行为中能窥察出哪些他们自恃拥有的有效力量？我不能放过战争中的每一个细节，以期从中一点一点地挖掘出日本人的民族性。

然而我的工作受制于我们正处于战争状态这一事实。这就意味着我将不能利用文化人类学家赖以生存的实地考察这一研究方法。我不能去日本，不能在日本人的普通家庭中通过自己的眼睛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并判断出哪些具有关键意义，而哪些不具有。我不能亲眼目睹他们作出决定时的复杂过程。我不能观察他们如何教育下一代。约翰·恩布利的《须惠村》是人类学家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写出来的唯一一部关于日本村落的著作，非常有价值。但很遗憾，该书没有涉及我们在1944年所面对的关于日本的种种问题。

尽管困难重重，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家，我还是相信我还有可资利用的研究方法和有利条件。至少我可以与对象国民直接接触，满足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条件。我国有很多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我可以询问他们许多生活中的具体经历，发现他们作判断时的思维模式，通过他们的叙述来消除我们知识结构中的盲点。我相信这类知识对一个人类学家了解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必要的。当时，进行日本学研究的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依靠的是书籍文献，通过对历史事件和统计数据的分析，以及日本方面的书面宣传和口头宣传来总结出规律。我却相信，他们所寻找的答案很多都隐藏在日本文化的内在逻辑和价值体系中。因此，我认为对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人进行研究将得到更令人满意的答案。

这并不是说我不看书，不去求证于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我从有关日本的汗牛充栋的文献以及在日本生活过的许多观察细致的西方人那儿得到了很大的帮助，而这些帮助是研究生活在亚马逊河发源地或新几内亚高原等地的无文字部落的人类学家们所

无法奢望的。那些民族没有文字，无法用文字表述自己。而西方人的表述又只停留在表面层次。他们的过去无从知道。实地考察的学者们必须发扬筚路蓝缕的精神去探索他们的经济生活、社会阶层以及宗教生活中的信仰对象等。我在研究日本时却有很多先行研究可资利用。在充满猎奇趣味的文献中到处都是关于生活细节的描写。西方人详细记录下了他们的生活经历，而日本人自己也作了很多生动的自我描述。日本和其他东方民族不同的一点是，他们具有强烈的自我描述的欲望，既描述私人生活片段，也描述海外扩张计划，其坦率程度让人惊讶。当然他们也是有所保留的，没有一个民族会和盘托出自己的全部内心。日本人在描述他们自己时会略去很多重要的事实，因为这些就像空气一样渗入了他们的全部生活，普通到了平时察觉不到的地步，就像美国人描述美国时一样。总而言之，日本民族是一个喜欢暴露自我的民族。

创立了物种起源论的达尔文在读书时特别留意那些无法理解的细节。我在阅读上述文献时也采用了这种达尔文式的读书方法。我要从国会演说的那一堆抽象概念中了解些什么？他们为什么对细枝末节的事大肆攻击，而对骇人听闻的暴行视而不见？这种反差反映出一些什么深层次的东西？我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质问：“这幅画有什么诡异的地方？”“为了理解这幅画，我得知道些什么？”

我还看了日本人编剧摄制的电影，包括宣传片、历史片以及描写东京和农村的现代题材的影片。我和一些在日本看过这些影片的日本人讨论过。他们都是从和我截然不同的视角来看影片中的男女主人公和反面人物的。一些情节让我非常费解，而他们却

并非如此。他们对故事情节、创作意图的理解也和我不一样。他们是从整部影片的结构来理解这些的。和看小说时一样，我的理解和他们这些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的理解大相径庭。在这些日本人中，有的总是习惯性地为日本的风俗人情辩解，而有的则对日本的一切都嗤之以鼻。很难说哪种人给了我更多的启示。我所能说的是，对自己的风俗习惯无论是接受还是排斥，他们对日本生活的描述方式却是一致的。

如果一个人类学家仅仅是直接从对象国及其国民身上搜集资料寻求解答，那么他的作用并不比那些在日本生活过的观察细致入微的西方人大多少，我们也不能指望他会对那些外国定居者关于日本的优秀的论著作出新的贡献了。一个文化人类学家完全有必要利用其所受的专业技能，花费一些精力为这个拥有众多的专业学者和观察家的领域添砖砌瓦。

我们已经知道了许多亚洲和大洋洲的文化。日本的许多风俗习惯和太平洋岛屿上的某些原始部落非常相似。这些部落或在马来诸岛，或在新几内亚，或在波利尼西亚。当然，根据这些相似性来推测古代民族的迁移与交流将是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但我的兴趣不在于此。对我来说，这些相似性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们暗示了这种历史相关性，而是因为它们（有时表现为差异）给了我打开理解日本生活方式大门的钥匙。我相信这些风俗习惯在单纯的文化模式中所起的基础性作用。我或多或少具有一些关于亚洲大陆的暹罗、缅甸和中国的知识，可以把日本和这些民族进行比较。它们共同构成了亚洲伟大的文化。这种比较文化研究的价值已经在很多人类学家关于原始民族的研究中得到了论证。一个部落的风俗习惯也许百分之九十与周边部落相同，但正是被

修改了的百分之十决定着他们与周边部落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这百分之十被修改的过程中，某些基本习俗会被排斥。但不管被排斥的这些在其习俗整体中占有多大的比例，都足以使这个民族朝着独特的方向发展下去。对于一个人类学家来说，对这种整体上具有许多共性的各民族之间的差异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人类学家还得尽可能克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距，并通过改进其研究方法来消除这种文化间的差距带来的障碍。经验告诉人类学家，处于不同文化中的人在遇到某些情况要对其进行阐释时，其方式存在着巨大差异。他们会在北极的一些乡村或热带沙漠中发现建立在血缘关系或经济交往基础上的部落习俗，这些习俗的离奇程度是任何富有想象力的头脑都无法设想的。人类学家不仅要调查亲属关系或交换关系的细节，还要弄明白这种习俗对部落行为方式造成的影响，以及每一代人如何从小受其制约，像其祖辈一样行事的。

我们在研究日本时同样可以像人类学家们所做的那样，重视这类差异、制约以及影响。现在几乎所有人都深切地感到了美国和日本在文化上不可逾越的差异。我们甚至这样来表述日本：凡是我们干的事，他们一定对着干。显然，一名研究者不能根据这类说法就轻率地得出结论说差异大到了无法理解这个民族的地步。人类学家的经验充分证明了任何差异都无法阻止研究者对其进行理解。与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研究者相比，人类学家能更好地把差异当作积极要素而非消极要素来利用。制度和民族间的差异程度越大，就越能引起他们的关注。他不会把他所研究的部落的生活方式中的任何东西当作理所当然的事实，这就使他不是把

目光聚集在少数代表性的事例上，而是扩散到每一个方面。在有关西方各民族的研究中，如果缺乏比较文化的目光，研究者往往会忽略许多行为的内在逻辑。他们总是将其视为不言而喻的事实，从而忽略了对日常生活中的细节以及人们对过于熟悉的事实的定论的质疑。然而，正是这类习惯或定论放大到整个民族的层面，就会影响到这个民族的未来。如此大的作用，远远不是外交官签订的这样那样的条约所能比拟的。

人类学家必须训练出研究日常生活细节的专业技能，因为他所研究的这些细节与其他民族的相应细节迥然不同。如果他想知道在某一部落中什么是最恶劣的行径或在另一部落中什么是最怯懦的行径，或者如果他想知道在某种特定情况下，这些部落将采取何种行动、有何感想，那么他将不得不加大对细节的观察力度，而这些细节在我们对文明民族的研究中往往被忽略。人类学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细节起着决定性作用。他们也应该学会如何从这些细节中挖掘真相。

我们在研究日本时可以借鉴这种方法。人类学家曾有过这样的论点：无论是在最原始的部落中还是在最文明的民族中，人类的行为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学来的。只有对一个民族日常生活的细节给予充分的重视，我们才能体会到这一论点的内涵。一个人无论行为或见解多么匪夷所思，其感性与理性总是和他的经验密切相关。我越觉得日本人的某种行为古怪，就越相信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着使这种古怪行为出现的某种平常因素。我的研究如果能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去，无疑将获益匪浅。人都是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成长起来的。

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家，我相信这样一个前提：无论看似多

么孤立的细枝末节，彼此之间都存在着某种系统的联系。我很重视无数个别行为如何汇聚到一个统一模式之中。任何社会都会制定某种机制以规训身处其中的人们的生活。这一机制对某些行为方式作出正面的价值判断，那么这个社会中的人就把这些判断视为全世界的基本结论。无论困难有多大，他们总是倾向于把这些判断纳入一个统一体中。如果人们接受了一种价值体系以保证其日常生活，就不可能同时在生活的另一些方面按照相反的价值体系来进行判断，否则就会陷入混乱与无序。他们努力追求和谐，为所有人安排了共同的理由和目的。为了使整个社会体系不至崩溃，一定程度的和谐是必须的。

这样一来，经济行为、家庭活动、宗教仪式和政治理念就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如果其中一个部门发生了相对更剧烈的变动，其他部门迫于追求和谐的需要势必面临着与之共同变动的压力。在权利欲露骨、尚无文字的社会中，权力意志不仅表现在经济交往以及和其他部落的相互关系中，也表现在宗教中。在留下了古典文献的文明民族中，教会保留着过去的言行录。而没有文字的部落却不是这样。但是，随着经济和政治话语权在公众中扩张，当彼此间发生冲突时，教会往往选择放弃自己的权力。字句得到了保留，但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宗教教义、经济活动和政治行为并不是用堤坝隔开的三个水池。这些堤坝都是假想出来的，实际情况是，它们彼此之间相互流动，掺和在一起难以分离。这是永恒的真理。一个学者越把他的研究扩展到经济、性行为、宗教以及育婴等领域，就越能对其所研究的社会中的种种现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从而在任何领域提出假说并寻找资料求证。这样他就能将任何民族的民族性诉求（无论这些诉求是政治

层面的、经济层面的还是道德层面的)理解为这个社会赋予它的民众的思维模式或行为惯性的表现。因此,本书并非一本专门讨论日本宗教、经济、政治或家庭的书,而是旨在探讨日本人为其生活方式设定的前提。本书所要描述的正是这些前提在其日常生活中的表现。总之,这是一本讨论日本民族何以如此这般的书。

我们在二十世纪所面临的一个难题是,我们往往囿于暧昧乃至偏颇的成见,不仅难以认识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同样难以认识美国何以成为美利坚民族、法国何以成为法兰西民族、俄国何以成为俄罗斯民族。这方面知识的欠缺使得国与国之间相互误解。有时分歧可能非常细微,但我们却在自己的臆想中将其无限放大。各个民族都建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其思维与行动的模式由此区别于其他民族。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我们却还大谈特谈共同理想。我们并没有尝试着去了解对方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如果我们去了解,就会发现,其实他们的某些行动并不一定就不好,只是因为这些行动不属于我们的行事方法而已。

我们不能轻信现成的各民族关于自己思维和行动模式的表述。每个民族的作家都试图表述自己的民族,但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任何民族都是戴着与其他民族不同的眼镜来观察事物的。在这一观察过程中,人们自身也很难意识到这一眼镜的存在。任何民族都把这当作理所当然的事,这一眼镜的焦距、视角对他们而言就好像是上帝先验地安排好了的一样。我们并不要求使用眼镜的人去分析眼镜的度数,不要求各个民族去思考他们的思维方式本身。我们可以把验明眼镜度数的任务交给一位眼科大夫。显然,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各民族面前扮演的正是这样一位眼

科大夫的角色。

这项工作要求我们既要严格又要宽容。我们有时会被指责为过于严格了。这样指责我们的人都是些世界主义者。他们竭力说服全世界的人相信，所谓东方和西方、黑人和白人、基督徒和穆斯林都是些表面差异，我们在深层次的人性上是共通的。这就是所谓的“四海之内皆兄弟”。这种说法很难让我信服：为什么相信“四海之内皆兄弟”就不能相信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这些过于宽容的人们似乎相信全世界各个民族都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否则他们怎么会相信世界真能大同呢？但是如果只有这种整齐划一的做法才算是尊重其他民族的话，这和神经质到要求自己的妻儿子女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有什么区别？严格的态度要求我们正视差异的存在。我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和平的多元世界。美国可以是一个美国式的国度，但这并不构成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法国、日本也都是这样。一个学者只要不像惧怕达摩克利斯之剑^①一样惧怕差异，那么他就会发现以外部压力来干涉民族内部的独立性是一件多么不道德的事。他也不用担心持这种态度会使世界的发展停滞。承认文化上的差异并不会延滞世界的发展。经历了伊丽莎白时代、安妮女王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并未因时代的变迁而丧失英国的特色。因为英国人始终是英国人，他们能适应不同的时代精神，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标准和气质。

对民族差异性进行研究时，既要求我们具有上述严格的态

① 达摩克利斯之剑，古希腊神话中，叙拉古僭主狄奥尼修斯一世宴请宠臣达摩克利斯，并让他坐在黄金宝座上。达摩克利斯发现自己的头上用马鬃悬着一把利剑，随时都有掉在自己头上的危险，深感恐惧。后用“达摩克利斯之剑”比喻危机迫在眉睫。